【主持人语】

民族地区文旅融合是文化保护、产业振兴与共同体建设的三维共振。民族地区文旅融合是把“绿水青山”和“文化瑰宝”转化为惠民产业、把文化传承嵌入市场循环的关键抓手，既能为文化保护注入内生动力，又能为乡村振兴开辟稳定赛道。云南为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具有多元文化传统，其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独特的机遇与复杂的挑战，需要专门化的发展策略。

本栏目两篇文章分别从云南丽江民族村寨居民生计转型个案、云南夜间文旅消费对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开展研究：《丽江石头城旅游民族村寨政策驱动型生计模式研究》以典型的纳西族村寨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ANT），采用参与式观察法、访谈法，探讨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异质行动者如何通过转译机制驱动传统生计网络向旅游兼业化网络演化，多元行动者如何通过转译过程构建行动者网络，共同驱动民族村寨旅游地的生计变迁，其联合驱动机制为何，未来的优化路径何在。文章解析了民族村寨旅游地在政策驱动下生计变迁的转译过程与驱动机制，厘清异质行动者围绕“民族村寨旅游化”强制通行点（OPP）进行在地化转译与调适，验证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发生变迁，最终提炼形成政策驱动型生计变迁模式。该模式呈现出政策嵌入性、生计兼业主导性、参与主体多元复合性的特点。并提出三条优化路径：注重乡村旅游从高速发展到长效可持续发展，重构行动者网络核心；构建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网络结构，深化转译过程；探索从单一生计到多元融合发展，强化网络韧性。文章拓展了民族村寨的旅游生计发展研究。《云南夜间文旅消费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结合旅游体验理论、顾客满意度理论，建立了包含旅游交通、文旅业态、公共服务、品牌影响和管理体系的多维评价体系。基于云南省13个国家级文旅集聚区的2 719份有效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异质性。将旅游体验、顾客满意度等理论引入多民族地区与夜间经济的交叉情境中，形成了“地方文化资源—夜间场景互动—游客满意度”的研究框架，深化对特定时空与文化背景下价值创造的认识；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群组分析，实证检验旅游交通、文旅业态、公共服务、品牌影响及管理体系五大变量对满意度的驱动路径和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推动研究从整体认知向细分异质深化；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识别出旅游交通的关键短板，并基于其影响机理与群体差异，提出“供给—需求—治理”协同提升策略，实现从实证发现到治理建议的逻辑闭环，有效探讨了夜间文旅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群体异质性及集聚区发展模式。为多民族地区夜间文旅消费差异化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实践参考。

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未来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共进为原则，以社区参与和利益共享为基石，以数字创新和人才培育为驱动，推动民族地区文旅产业实现从资源展示到文化体验、从单点开发到全域联动、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根本性转变，让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真正成为文化保护、产业振兴与共同体建设的三维共振。

（明庆忠，云南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

丽江石头城旅游民族村寨政策驱动型生计模式研究*

李智环，赵芷妍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以云南丽江宝山石头城为研究案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综合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解析政策驱动下民族村寨旅游地的生计变迁转译过程与内在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东巴文化、梯田系统、传统砌石民居等非人类行动者，以其物质层面的形态惰性与文化层面的符号刚性，在一定程度上限

* ［作者简介］李智环，女，辽宁丹东人，贵州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贵州大学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大学民族文化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关系、西南边疆；赵芷妍，女，湖北荆州人，贵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旅游、民族社会学。

［基金项目］贵州省2023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21世纪以来贵州民族人口变迁研究”（23GZZD17）；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资助。

制了大规模标准化旅游开发的推进空间；异质行动者围绕“民族村寨旅游化”这一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简称 OPP）开展在地化转译与调适，推动当地生计资本结构与生计策略发生变迁，最终形成政策驱动型生计变迁模式，整体呈现出政策嵌入性、兼业主导性、多元复合性三大特征。通过与大理喜洲古镇“市场驱动型”旅游发展路径的系统对比，结合行动者网络的治理演化特征，提出三条优化路径：一是推动乡村旅游从高速扩张转向长效可持续发展，重构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节点；二是推动治理结构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深化转译效能；三是探索从单一生计模式向多元融合发展升级，强化行动者网络的整体韧性。本研究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西南民族村寨生计变迁领域的应用边界，也为乡村旅游振兴实践提供了一个具备过程性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民族村寨旅游；生计变迁；生计模式；乡村振兴；丽江石头城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6）05－0053－11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6.05.006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领域的重要支撑。民族村寨作为民族文化的活态载体，依托特色资源发展的乡村旅游，已成为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产业之一。生计是人们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方法和手段。[①] Teresa Chang-Hung Tao 2006 年将可持续生计概念引入旅游研究领域，旅游被视为一种可持续生计策略。[②] 农户作为乡村旅游发展最直接的参与主体与受益主体，其生计方式的变迁构成了观察乡村振兴微观实践的核心维度。合理的生计方式转型，既能够在微观层面提升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活水平，也能在宏观层面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因此，从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视角切入，聚焦民族村寨农户的生计变迁过程展开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石头城（纳西语称“剌宝鲁盘窝”），隶属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宝山乡，整座村落因建在一块面积约 0.5 km^2 的蘑菇状巨石上而得名。其南北西三面皆被高山合围，东面石坡直插金沙江，巨石外围的缓坡上层层叠叠分布着梯田，可谓一座依托天险形成的村寨。石头城现有常住人口 123 户 456 人，其中大部分为纳西族，至今仍保留着棒棒会、三多节、火把节等传统民族文化活动，是极具代表性的纳西族村寨。依托高原峡谷生态与纳西原生文化的独特资源禀赋，石头城的旅游业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便已萌芽，但受限于闭塞的地理位置条件，旅游规模化开发滞后。在旅游开发全面推进前，当地村民依靠农业种植与牲畜饲养的合理配置维持家庭基本生计，同时利用农闲时段外出务工拓宽收入渠道，整体经济模式以自给自足为主，家庭和村社构成了相对封闭的生产—消费单元。2012 年，宝山石头城被正式列入首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对其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成为玉龙县委、县政府的共识。在持续的政策驱动与村民的主动调适下，石头城逐步从封闭自给的原生纳西族村寨，转型为开放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村寨生计演化呈现出两个递进阶段：第一阶段为传统务农务工主导的生计模式，第二阶段为旅游深度嵌入的兼业化生计模式，整体呈现出“政府主导、政策赋能、逐步融合”的特征。受“石头为基、梯田为衣”生产生活模式，以及“天险之城”地理位置约束，石头城与城镇内相对成熟的景区形成显著差异：商业化程度低，在地民族文化原生性保留完整，从中可以直观地体现出民族村寨生计的变迁。基于此，本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综合采用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以云南丽江宝山石头城为例，旨在探讨四大递进式研究问题：在乡村旅游开发进程中，异质行动者如何通过转译机制驱动传统生计网络向旅游兼业化网络演化？多元行动者如何通过转译过程构建行动者网络，共同驱动民族村寨旅游地的生计变迁？其联合驱动生计转型机制是什么？未来的优化路径何在？以期拓展旅游生计领域的理论分析视角，也为民族村寨的乡村旅游振兴实践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指引。

① 周大鸣，秦红增. 文化人类学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45.

② TERESA Chang-Hung Tao. Tourism as a livelihood strategy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case studies from Taiwan［D］. Waterloo：University of Waterloo，2006.

一、文献综述

（一）乡村旅游生计的相关研究

旅游被学界广泛认定为一种可持续生计策略，学界围绕乡村旅游生计已形成多维度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对乡村旅游可持续生计的研究。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认为可持续生计由自然、社会、人力、物质和金融5个基本方面构成。此后，学者基于这一框架展开研究。李飞等指出乡村旅游改变了农户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形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替代手段。[①] 吴冰等探讨了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形成合力驱动乡村振兴。[②] 二是对乡村旅游生计资本的研究。史玉丁等认为合理利用资源、社会等优势生计资本，引导人力、物质等劣势生计资本，可促进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③] 李会琴等探讨了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发现乡村旅游降低了生计脆弱性。[④] 三是对乡村旅游生计效应的研究。李冬花等提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⑤] 刘佳等认为乡村旅游发展呈现“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的直接效应和“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空间溢出效应。[⑥]

（二）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研究

民族村寨蕴含着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审美心理，具有重要的旅游开发价值。[⑦] 国内学界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现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初期以概念内涵界定为主：罗永常指出，民族村寨旅游是以民族村寨为目的地，体验原生态民族文化以满足求新求异心理的旅游活动[⑧]；肖琼认为民族村寨旅游以民族文化与特色景观为吸引点，具有民族性与文化性两大属性[⑨]。随着研究持续深入，学界研究方向从基础理论概念拓展到实践应用层面，主要包括影响因素[⑩]、产品开发[⑪]、游客体验[⑫]、居民感知[⑬]、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⑭]等方面。我国绝大多数民族村寨区位偏远，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偏低，

---

① 李飞，杨栋，王厚全. 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乡村旅游影响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梨花村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2，（8）：405-407.

② 吴冰，张佳敏，贾榕榕，等. 乡村旅游推动居民角色认同与可持续生计互动机理研究：以咸阳市袁家村和马嵬驿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6）：125-139.

③ 史玉丁，李建军.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 旅游学刊，2018，（2）：15-26.

④ 李会琴，谢雪莲，董晓晴. 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机理研究［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9，（4）：35-47.

⑤ 李冬花，王咏，陆林. 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实证［J］. 自然资源学报，2023，（2）：511-528.

⑥ 刘佳，赵青华，王慧.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2023，（2）：490-510.

⑦ 周慧玲，檀子瑜，蒋亚军，等. 民族村寨旅游短视频符号感知的量表构建与验证［J］. 中国生态旅游，2024，（2）：286-303.

⑧ 罗永常.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03，（2）：102-107.

⑨ 肖琼. 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发展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178.

⑩ 张春艳，李军，罗永常. 民族村寨旅游价值评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典型案例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3）：98-101＋204.

⑪ 钟洁. 基于游憩体验质量的民族村寨旅游产品优化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四川甲居藏寨为例［J］. 旅游学刊，2012，（8）：95-103.

⑫ 杨振之，潘金玉. 民族村寨旅游地游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与应对：以西江苗寨为例［J］. 民族学刊，2022，（11）：69-78＋149.

⑬ 银松，李瑞，殷红梅.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居民地方性感知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雷公山地区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2023，（3）：144-156.

⑭ 曾美玲. 民族村寨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与路径：以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为例［J］. 社会科学家，2026，（4）：105-111.

旅游产业是促进当地发展的重要手段，相关研究未来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三）研究述评

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当前关于乡村旅游生计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多聚焦于对单一主体的结构化分析，而对多元主体如何通过动态互动、协商与博弈共同塑造生计变迁过程的内在作用机理则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分析丽江宝山石头城旅游发展驱动生计变迁的过程与机制。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为：一是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引入纳西族村寨研究，拓展该理论在高原峡谷民族地区的案例适用性；二是构建“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分析框架，揭示梯田的空间规训作用、电影作品的远程征召效应；三是建立“过程—事件”分析模型，弥补生计研究动态性不足的短板。

二、石头城旅游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的行动者网络演进

石头城的生计变迁并非单一力量所致，而是地方政府、村民、企业、游客、媒体，乃至自然景观、纳西文化等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转译”过程，能够清晰揭示传统农耕生计网络是如何被解构，并重组为开放的、以旅游为导向的现代生计网络的动态历程。

（一）行动者构成

基于对称性原则，非人类实体与人类都是能够施加影响、改变事态发展的行动者。[①] 石头城旅游兼业化生计阶段的主要人类行动者包括玉龙县委、县政府、石头城村委会、村民、旅游企业（云南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丽江宝山石头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游客等。与传统生计阶段相比，媒体、房屋、土地、自然景观、纳西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在政策驱动下加入了这一行动者网络。

（二）转译过程

1. 问题呈现

转译发生前，各行动者都有自身的利益与诉求，也面临相应的问题与障碍。为实现各自的目标，都必须经过一个关键节点即强制通行点。[②] 从人类行动者的维度来看，玉龙县委、县政府希望通过旅游开发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石头城村委会则期望解决基础设施薄弱、人居环境差、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等现实问题。石头城副支书在访谈中说道：“我在宝山村当了16年支书，大半辈子奔走在这片土地上，想为石头城找寻方向。各种力量介入，带来了契机，但也夺走了土地与人口。农村失去青年，乡村如何振兴?”[③] 村民希望拓宽增收渠道，改善生活质量。“仅靠种田养活不了一家人，没发展旅游的时候，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像我们中年人，要照顾老人没办法离家太远，只能（一边）兼顾种田，（一边）去离家近的地方赚钱”。[④] 旅游企业希望通过商业化开发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面对当下大量同质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游客更期望获得原生态的旅游体验。从非人类行动者的维度来看，媒体期望通过对村寨的宣传，在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同时，更好地传播当地独有的民族文化；受劳动力外流的影响，村里不少房屋、土地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资源利用率偏低；自然景观、纳西族传统文化虽保存完好，但对应的旅游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因此，如何将石头城独有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优势，是当前异质行动者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基于这一现实，玉龙县委、县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将“民族村寨旅游化”确立为核心发展议题（即OPP），希望通过这一方向最大程度地解决上述现实难题，满足各方的合理利益诉求。

2. 利益赋予

在利益赋予环节，核心行动者围绕OPP，将各行动者的目标锁定并稳定在网络规划中，形成利益联

① 张志明，陈海鹰，戴健驰，等. 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过程与机理分析：以海口龙鳞村为例［J］. 旅游学刊，2023，（7）：97-112.

② 杨忍，徐茜，周敬东，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J］. 地理科学，2018，（11）：1817-1827.

③ 访谈对象：木WC，男，58岁，纳西族，大专学历，石头城副支书；访谈时间：2023年8月10日；访谈地点：宝山村委会。

④ 访谈对象：和SQ，男，52岁，纳西族，初中学历，农民；访谈时间：2023年8月8日；访谈地点：石头城街口。

盟，为后续征召与动员奠定基础。[①] 玉龙县委、县政府为所有行动者构建了共同愿景：以民族村寨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石头城的全面乡村振兴。对于县委、县政府而言，石头城的旅游开发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创新尝试，更是落实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政策要求的重要转译载体；村委会作为上级政府与本地村民的中间纽带，既是利益协调者也是规则执行者，可依托乡村旅游发展，增加村集体收入，增强社区凝聚力；村民作为旅游开发的直接受益主体，能借此明显改善人居生活环境，实现经济收入的显著提升；参与开发的旅游企业可实现资本增值，保障项目可持续盈利；游客能够获得原真性在地旅游体验。非人类行动者层面，媒体可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长期闲置的房屋、土地资源得到有效盘活；原本保存完好的自然景观、纳西族传统文化，也能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获得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所有异质行动者都能在聚焦 OPP 的过程中获取各自的预期利益，由此被招募为行动者网络的成员，共同推动石头城传统生计模式向旅游兼业化方向转型。

3．*征召与动员*

核心行动者以征召的方式分派其他行动者特定的角色、任务与目标，通过动员确保其协调行动，维护网络的有效运作。[②] 巨石之上的石头城不仅是一个承载空间，更是能对一切人类实践形成刚性约束的能动者，它的物质属性决定了转译过程的可能性边界。东巴文化、梯田水系与砌石民居等非人类行动者，以其物质层面的形态惰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规模的标准化改造，迫使各行动者持续展开协商，最终形成深嵌于本土物质性与文化生态的旅游发展模式。玉龙县委、县政府将各类异质行动者整合进旅游发展的整体网络中，通过四类征召与动员方式，实现网络在地化的转译与调适。

（1）行政征召与动员：基础设施的空间规训

玉龙县委、县政府明确核心发展方向，通过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等方式，动员乡、村两级组织落实石头城的保护与开发工作。2015 年，投入 400 万元改造消防、排污系统，修建观景台、栈道。基础设施均采取依地势蜿蜒布设、见缝插针的建造方式，让旅游景观与农业生产景观相互镶嵌，构成“生产性景观”的观赏体验。2016 年，当地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总体思路和目标。2022 年，启动 2 700 万元环山公路修建项目，计划占地 60 亩。政府依托自身行政号召力，动员各行动者对村貌和空间进行改造，完成道路硬化、危房维护、公共广场绿化等一系列基础工程，为后续旅游发展奠定基础。民族地区作为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其生态环境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影响。石头城的梯田系统是纳西族人民与高山环境协同演化形成的水利生态工程，大规模地貌扰动极易引发水系破坏和滑坡地质风险，这也客观倒逼旅游开发必须走小尺度、精细化介入的路径。在排除异议环节，针对项目占地补偿和生态保护相关事宜，搬迁办副主任和 HZ 与村民开展了民主协商：“县里要求尽量少占个体农田，绕路保田会增加成本，补偿款需逐户商议。”[③] 这一过程，正是权力与利益在微观层面博弈的直接体现。

（2）经济征召与动员：从信贷支持到公司化运营

2016 年，在政策支持下，当地农商行、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为村民提供低息信贷。村民木 JH 因此开办了一家拥有 6 间客房的客栈，她提到：“政府给物资援助和贷款，村里人看到赚钱也跟着开。客栈平时由我经营，旅游旺季会雇用村里人来帮忙。”[④] 在经济帮扶下，一批村民自营的农家乐、客栈、游船项目陆续开始营业，石头城的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成型，基本具备旅游接待能力。有经营游船的村民介绍：“渡江游船生

① 胡安安，王斐，甘雪娜．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生计演化过程与驱动机制：以云南诺邓古村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5，（9）：199-208.

② 于伟，刘淑敏，王敏，等．行动者网络视角下旅游驱动乡村转型的过程与机制：以沂南县竹泉村为例［J］．中国生态旅游，2023，（4）：679-693.

③ 访谈对象：和 HZ，男，47 岁，纳西族，大学学历，玉龙县搬迁安置办副主任；访谈时间：2023 年 8 月 10 日；访谈地点：宝山村委会。

④ 访谈对象：木 JH，女，43 岁，纳西族，初中学历，宝石驿站老板；访谈时间：2023 年 8 月 16 日；访谈地点：宝石驿站。

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三千多元。平时支出就是买机油和按时检修游船，收入是可以的。”① 同年，兴宝农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征召村民入股发展软籽石榴 1000 亩，建立软籽石榴种植基地。此外，政府发布《丽江宝山石头城景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招商引资》公告，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旅游地建设。石头城的民居与天然巨岩融为一体，它不仅是代代传承的祖屋，更是与巨岩共存的生命单元。这一特殊的空间属性，让社会资本无法采用常规的征地拆迁、整体重建的商业化开发模式，必须做出本土化的适应性调整。以丽世酒店为代表的外来企业，在尊重原有建筑边界与岩基共生关系的前提下，仅对民居内部功能做精微置换；以签订 30 年长期租赁合同的方式盘活村内闲置院落，让村民转化为“收租者 + 雇工”的双重身份，也推动了村寨功能的有机更新。有参与合作的村民说：“丽世酒店想来我们村开客栈，最后决定租我家院子，他们每年交付租金给我。我还在他们那里上班，主要负责接待客人的工作，有时担任导游。”②

（3）景观征召与动员：媒体作为能动性行动者

石头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纳西族原生文化吸引了中央电视台等多家知名媒体前来报道，《云上石头城》等影视剧组也先后入驻取景拍摄。2017 年上映的电影《云上石头城》以本地村民木石龙为原型，将纳西族的真实生活转译为可传播的文化商品，影片获评“第 26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电影展优秀新片奖”。这部电影作为非人类行动者，通过符号生产实现远距离征召，带动央视、抖音等各类传播平台持续报道，为石头城建构起极具“原真性”的旅游形象。

（4）文化征召与动员：传统的发明与商品化

政府推动恢复三多节、祭天仪式等纳西族传统民俗，将纳西族打跳转化为日常化的游客互动展演，把东巴文化纳入地方民族文化叙事体系中，将其转译为可集中展示、可流通传播的消费符号，服务于文旅经济发展与地方特色形象塑造的核心需求。当地客栈老板和 FY 特意花重金邀请东巴为自家民宿书写门联。她坦言：“想突出自家民宿的特色，但我并不认识东巴文，就花钱请东巴来写。”③ 这类脱离原生民俗语境的文化符号，成为吸引游客注意力的“漂浮所指”④。

4. 异议与网络脆弱性

石头城在生计变迁的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在环境治理、经营风险、投资效益等方面显现出异议，影响了行动者网络的正常运行。旅游开发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消耗与破坏，对原生生态环境形成一定冲击，进一步压缩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空间。有村民回忆道：“以前，这边山上有豹子，还有猴子在江边喝水。旅游开发后，砍树修路，生态环境变差了。”⑤ 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季节性的特点，受外部环境以及自身动力影响，会产生剧烈波动，加深了村民生计的脆弱性。⑥ 2020 年疫情作为意外的非人类行动者，直接阻断游客流动，使 OPP 短暂失效，旅游相关的经济收益被切断（详见表 1）。不少村民的生计被迫回退到务农与务工的状态，暴露了整个行动者网络单一依赖旅游产业的脆弱性。此外，国内多数同类景区的开发普遍以观光体验为主，集休闲娱乐与度假于一体。石头城也是如此，其规划投资规模大、项目回报周期长。但旅游市场往往变化无常，雷同的开发模式极易引发游客审美疲劳，最终导致投资效益无法保障。面对异议，异质行动者通过民主协商、沟通交流等方式稳固 OPP，以此维护行动者网络的相对稳定。

---

① 访谈对象：和 GB，男，50 岁，纳西族，小学学历，渡江游船老板；访谈时间：2023 年 8 月 11 日；访谈地点：渡江游船。

② 访谈对象：和 SY，女，40 岁，纳西族，高中学历，丽世山居管家；访谈时间：2023 年 8 月 16 日；访谈地点：丽世山居。

③ 访谈对象：和 FY，女，58 岁，纳西族，高中学历，金水石玉客栈老板；访谈时间：2023 年 8 月 12 日；访谈地点：金水石玉客栈。

④ “漂浮所指”：符号学与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指特定文化符号脱离原生语境，在新的场景中被挪用与诠释时，其原本的意义发生松动、游移乃至被置换的过程与状态。

⑤ 访谈对象：和 SH，男，79 岁，纳西族，初中学历，老年体育协会会长；访谈时间：2023 年 8 月 11 日；访谈地点：和 SH 家中。

⑥ 郭华，杨玉香. 可持续乡村旅游生计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2020，（9）：134-148.

表 1　2017—2019 年宝山石头城旅游收益情况

年份	接待游客批次（旅游团，不含散客）	接待游客人数	全年收益/万元
2017	35	2 000	8
2018	80	8 000	15
2019	220	22 000	37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宝山村委会的访谈信息。

（三）“有机团结”式行动者网络构建

在传统生计阶段，石头城依托重复性农业生产、围绕单一家庭生存目标，形成了“机械团结”式行动者网络，对应的 OPP 是“依靠土地与劳动力流动维持家庭再生产”。由于网络结构的封闭性、分散性，以及核心行动者的缺位，“机械团结”式行动者网络的延续陷入困境。2012 年，宝山石头城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成为核心行动者介入的触发点。玉龙县委、县政府以此为契机构建新 OPP“民族村寨旅游化”，形成利益联盟。政府依托强大的号召力，采取行政、经济、景观及文化等多种机制，自上而下进行征召与动员，并不断调适，排除异议，实现资源整合与效益转化。在此过程中，多元行动者交融共栖，共同编织了一张“有机团结”式行动者网络，推动当地生计方式从传统的务工务农向以旅游兼业化为主导的多元融合发展方向转型，最终形成“农业打底、旅游增收、务工补偿”的生计组合结构。

三、石头城旅游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的行动者网络驱动机制

石头城的生计变迁，是各类异质行动者协同转译的结果。资源禀赋、村民能动性、特色农业等内生因素共同构成了行动者网络转型的物质基础；政策扶持、社会资本、主流媒体等外援因素，则进一步加速并重塑了网络转型的路径与规模。外援动力有效激活并放大了内生动力，被充分激活的内生动力又进一步增强了对外援动力的吸附与转化能力。二者通过核心行动者的实践被系统地征召与动员，最终推动生计网络的升级。

（一）内生动力

1．资源禀赋

自然景观、地理环境、纳西族原生文化，以及因劳动力外流而长期闲置的房屋与土地，共同构成了石头城生计变迁的物质基础，并通过转译过程塑造了新的生计网络。在所有行动者的共同愿景框架下，政府的治理政绩、村委会的社区凝聚力、村民的家庭经济增收、旅游企业的经营利润、游客的“原真性”在地体验等各类预期利益，都必须依托资源禀赋来实现。无论是行政征召下的基础设施改造，经济征召下的经营实践，还是景观征召下的媒体宣传、文化征召下的品牌塑造，所有动员措施最终都落脚于具体的资源之上。

2．村民能动性

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指出，人的行为选择在自身认知、环境和信息的影响下，能有限度地实现理性。[①] 因地理位置闭塞，早年石头城村民主要依靠传统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模式，维持家庭基本生存需求。2012 年，宝山石头城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当地政府顺势启动系统性旅游开发工作，鼓励村民参与旅游产业。部分村民结合家庭劳动力结构、房屋位置条件等实际情况，策略性地选择自主开办客栈或是出租院落，将宏观层面的旅游扶持政策转译为符合个体理性的生计决策。在经营实践中，村民们通过雇佣邻里务工、采购本地农产品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社区内部的经济联结。随着旅游产业发展持续创收，石头城的民族村寨旅游也从最初的少量村民参与、个体自发经营，逐步转向政府配套支持、全村广泛参与的规模化发展阶段。面对外部冲击导致的旅游间歇性中断，村民能够灵活调整生计策略以应对风险，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行动者网络的抗风险韧性。

3．特色农业

石头城的苞谷酒、核桃油、“宝山猪”等农特产品既契合了游客对“原真性”在地体验的期望，更将传统农业生产资料与村民日常劳动过程转译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实现了农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当旅游业受外部冲击呈现出间歇营业状态与季节性波动时，持续的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能为村民提供基

① 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4，(4)：91-101.

本的经济缓冲，降低生计系统陷入困境的风险。这种“以农稳旅”的功能，正是石头城旅游行动者网络得以稳定存续和有机运行的重要保障。

（二）外援动力

1．政策支持

在国家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战略引领下，云南省政府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持续打造“彩云之南，旅游天堂”品牌，并于 2019 年启动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打通石头城与周边旅游景点的内外交通网络，实现区域文旅资源的互联互通。石头城先后于 2006 年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 年纳入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这些国家级荣誉共同构成了石头城旅游开发的核心政策资本。玉龙县将上级政策与本地生态、文化和农业资源紧密结合，探索出“旅游反哺农业”“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联动”等发展路径，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本土发展成果。2022 年启动总投资 2 700 万元的环山公路项目，以打通长期制约石头城发展的交通瓶颈；2024 年又推出总投资 4.5 亿元的“梦境宝山·云上石头城”旅游开发项目，并在第五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公开推介招商。当村寨内各类异质行动者面临发展诉求碎片化、资源价值待转化等现实困境时，玉龙县委、县政府牵头提出 OPP，并推动落地实施。面对异议，政府通过民主协商、基础设施持续投入等方式，不断稳固“发展旅游”的主流共识，使原本可能因内部利益张力而瓦解的多元合作得以延续，最终推动整个行动者网络的有机运行。此外，政策并非单向度地塑造地方发展路径，而是在转译过程中与石头城特殊的地形约束、文化特性及村民诉求持续互动调适，这一过程体现了非人类行动者对政策落地的反向塑造作用。

2．外来企业

尽管政府设定了 OPP，但缺乏将资源转化为市场化旅游产品的关键运营能力，外来企业通过引入资本、技术与市场等要素，填补了这一能力空缺。云南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丽江宝山石头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投资与合作注入金融动能，破解了基础设施与产业孵化的资金难题。同时，企业还将现代经营理念与管理体系引入本地，推动当地传统生计形态从自然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在此过程中，石头城的资源禀赋被重组为市场竞争力，从而驱动了当地村民生计方式的根本性变迁。

3．媒体

本土题材电影《云上石头城》作为一次情感化、大规模的媒介征召实践，将石头城真实的在地生活转译为具有感染力的影像文化产品，增强了纳西族文化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各类媒体的持续报道，不断塑造着石头城的旅游形象，为其赋予了“原真性”“神秘性”与“可消费性”的独特符号价值。在符号生产、意义赋予与跨区域空间连接过程中，媒体不仅推动石头城的资源禀赋完成向旅游吸引物的转化，更为企业的投资信心、游客的到访意愿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提供了持续的正向动能，为行动者网络注入关键的外部驱动力。

四、滇西北旅游民族村寨两种生计模式：石头城与喜洲古镇的对比

滇西北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聚居着纳西、藏、傈僳、白、彝等十余个世居民族。区域内的民族村寨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文化基因，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元生计模式。丽江宝山石头城与大理喜洲古镇是滇西北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典型缩影，二者共享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等宏观政策语境，均以旅游驱动生计转型。但在生计基础、转译过程、行动者网络特征等方面却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以物质刚性塑造了政策驱动的转译逻辑，后者以资源优势孕育了自发协同的网络形态。因此，将两处民族村寨进行系统性对比，分析生计变迁的多样化路径，可以为不同资源禀赋的民族村寨精准施策提供实践参考（详见表 2）。

表 2　石头城与喜洲古镇生计模式差异对比

生计模式	石头城	喜洲古镇
生计基础	“高原峡谷生态 + 纳西族原生文化”的资源约束型模式	“平原农耕 + 白族民俗文化”的优势驱动型模式
转译过程	被动触发—政策主导—逐步融合	自发萌芽—市场驱动—多元共治
网络特征	松散型、低融合型	紧密型、高融合型

（一）石头城与喜洲古镇生计模式对比

1．生计基础对比

石头城的旅游生计以“高原峡谷生态＋纳西族原生文化”为基础，受当地资源禀赋的刚性约束。其地处金沙江峡谷，交通闭塞，耕地以梯田为主，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当地纳西族文化原生性强，但受地理阻隔对外传播难度大，险峻山石、金沙江峡谷、梯田风光等自然景观开发难度大。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石头城旅游开发起步晚、发展速度缓，产业发展依赖外部政策与资本的推动，旅游生计具有脆弱性。喜洲古镇的旅游生计基础以“平原农耕＋白族民俗文化”为核心，先天资源优势突出。其地处洱海平坝，耕地肥沃，交通便利，传统农耕生产效率高，白族手工业传承历史悠久，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商品经济。在区位上，喜洲古镇紧邻大理古城、洱海等核心旅游景区，可依托区域旅游资源实现联动发展。这种优越的初始条件使喜洲的旅游开发起步更早，文旅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也更高。

2．转译过程对比

石头城的生计变迁呈现“被动触发—政策主导—逐步融合”的演进特征。2012 年其被列入首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成为当地生计变迁的触发点。此前，石头城长期处于传统生计阶段，核心行动者的缺位导致转译过程多次失败。2012 年后，玉龙县委、县政府成为核心行动者，构建起民族村寨旅游化的行动者网络，当地生计模式也随之逐步转型为“旅游＋农业＋务工”的多元兼业模式。喜洲古镇的生计变迁则呈现“自发萌芽—市场驱动—多元共治”的特征。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大理旅游业的兴起，当地村委会创办“喜洲白族民居民俗旅游”项目，形成旅游生计的早期萌芽。21 世纪初，以林登为代表的外籍乡贤抓住旅游发展契机，与镇政府合作，共同探索出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转译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最终形成“旅游主导、文化赋能、农业补充”的规模化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3．网络特征对比

石头城的行动者网络呈现“松散型、低融合”的特征。异质行动者之间主要以政策为纽带，市场化经济联结相对薄弱。网络分工形态相对简单，政府负责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负责闲置文旅资源盘活，村民主要从事住宿、餐饮等基础旅游服务，本土文化资源的商品化转化程度偏低。此外，该网络整体韧性较差，受外部冲击影响，旅游活动中断后生计易回退至传统农耕模式。喜洲古镇的行动者网络则呈现“紧密型、高融合”的特征。行动者之间通过经济联结与文化联结的深度融合，推动旅游、农业、手工业等多个生计模块形成相互支撑的协同关系，共同构建起风险共担的抵御机制，形成了白族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格局。

（二）滇西北民族村寨旅游生计变迁的共性规律与差异化路径

以石头城与喜洲古镇为代表的滇西北民族村寨的现代化发展，本质上是民族文化遗产、自然生态禀赋与外部市场、政策力量多重交织下的生计转型与社会重构过程。二者既遵循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普遍逻辑，又因资源禀赋、行动主体与行动者网络结构的差异，呈现出路径分野。

从共性规律来看，两地民族村寨均实现了从传统生计向现代多元生计的转型，旅游产业成为驱动生计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二者的转型均以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为基底，依托传统村落、非遗技艺、乡土景观等文化遗产完成资源的商品化转译，凸显出旅游发展对本土文化与生态的深度依赖。同时，两地的生计变迁过程均嵌入国家政策、地方治理与市场机制的多重行动网络之中，逐步形成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支撑的格局，印证了滇西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农旅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逻辑。

从差异化路径来看，滇西北民族村寨旅游生计变迁形成了两种典型路径，具体可分为政策驱动型路径与市场驱动型路径两类。政策驱动型路径适用于区位偏远、资源开发难度大、市场化程度低的民族村寨。其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政策赋能、缓慢渗透”；生计转型以旅游兼业为主，保留传统农业作为生计缓冲。市场驱动型路径适用于区位条件优越、市场化程度高的民族村寨，其核心特征是“市场主导、多元协同、快速迭代”；生计转型以“旅游主导”为主，传统农业与手工业作为文化载体融入旅游发展之中，形成“农文旅”深度融合的生计模式。

五、石头城旅游生计变迁优化路径：构建韧性行动者网络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视角，石头城的生计变迁过程揭示了民族村寨现代化发展的演进逻辑。当前以旅游收益最大化为导向、以政策纽带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结构，虽在短期内实现了当地经济增长，却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危机，导致网络发展目标与地方文化生态本体发生脱嵌。这一现实要求我们突破单一经济指标、政策主导的传统发展范式，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多元共生生计体系，探索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基于ANT的网络构型思维，提出如下3条优化路径。

（一）重构网络核心：从经济高速增长到经济文化生态协同可持续发展

当前“民族村寨旅游化”的行动者网络强制通行点（OPP）定位过于宽泛且单一经济导向，虽在发展初期实现了表面化的网络整合，但其内在结构性缺陷随着网络发展日益凸显。为建设可持续生计网络，应将原有的OPP凝练为“纳西族文化—生态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将经济增长重新嵌入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的框架之中。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保护性开发。划定核心区、缓冲区，限制每日游客承载量（建议≤500人），维护好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二是资源整合。串联周边太子关、吾木村、元跨革囊渡江遗址等，打造“金沙江纳西族文化遗产走廊”三日游旅游线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空间再生产。三是沉浸体验深化。设立东巴文化传习工坊，引导游客深度参与文化实践；构建“前店后厂”式手工艺工坊，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课，邀请游客参与简易制作工序，实现从观赏、参与到理解的体验闭环。四是在地产业构建。组建由民族文化学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村寨长老共同构成的文化顾问委员会，保障民族文化的原真性，通过“老带新”传承模式培育青年传承人，打造“纳西源生”在地文化IP品牌，实现文化遗产向长期可持续生计资源的转化。

（二）深化转译过程：构建多元共治结构

石头城当前的旅游生计网络过度依赖玉龙县委、县政府作为单一核心行动者，存在结构性抗风险短板。这种非对称结构会导致信息纵向传递失真；地方性知识难以进入网络决策环节。要实现网络治理的深化，需从行动者征召机制的根本性变革入手，构建多中心的协商治理结构。具体可建立政府—企业—村民三方联合董事会，构建具有弹性、包容性与创新性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共建共生的“旅游命运共同体”格局。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推行股份合作制。村民以土地、房屋、劳动力等入股（建议村民持股比例≥30%），与丽世酒店等企业结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联盟，形成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二是培育互助组织。由村内14家客栈联合发起成立“石头城民宿协会”，通过统一物资采购、定价、培训的模式，提升村寨旅游服务标准化水平。三是建立民主协商机制。每季度召开“村民—企业—政府”三方议事会，修路补偿、收益分配等议题须经参会方2/3多数表决通过，从制度层面维持旅游开发的和谐局面。

（三）强化网络韧性：培育异质生计模块

石头城生计网络的根本脆弱性，在于单一旅游生计模块的主导性扩张，挤压了农业与文化模块的运作空间，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网络结构。而多元生计网络通过旅游、农业、养殖三大模块的功能互补，不仅能有效缓解外部冲击，更能通过模块间的协同联动持续释放发展潜能，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循环。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广“软籽石榴+芸豆”立体种植模式，可降低30%的劳动力投入需求，通过农旅融合与体验式消费实现产品增值，溢价销售。二是特色品种保护。将“宝山猪”纳入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培育序列，打造独特的地域品牌，与高端餐厅签订供应协议，年增收预计2 000元/户。三是设立应急储备金。从旅游收入中提取5%作为专项风险准备金，在突发性危机、区域性灾害等旅游停滞期定向发放给村民维持基本生计，从基层层面维护社会稳定。

六、结　论

宝山石头城是滇西北边缘型民族村寨依托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本文以石头城为例，与喜洲古镇进行系统对比，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分析民族村寨旅游生计方式的演变过程、驱动机制及优化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石头城生计模式经历了务工务农传统生计和旅游兼业化生计两个阶段，行动者网络强制通行点

（OPP）从“依靠土地与劳动力流动维持家庭再生产”向“民族村寨旅游化”转变。其生计变迁是玉龙县委、县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行政、经济、景观、文化四维征召机制，将梯田、房屋、纳西族原生文化、在地影视IP等非人类行动者纳入网络的转译过程。在这一长期演进过程中，异质行动者通过持续协商与调适，最终形成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二）石头城的生计演变主要受资源禀赋、村民主体能动性、特色农业等内生动力，与政策、资本、媒体等外援动力的双重驱动。二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行动者网络中的异议排除与角色调适实现互构共生。具体而言，内生因素层面，资源禀赋是生计变迁的物质基础，村民的主体能动性编织了“民族村寨旅游化”的行动者网络，特色农业是网络可持续运转的基石；外援因素层面，政府政策为网络的整体形成规划了发展蓝图，外来文旅资本为生计变迁注入了产业动能，媒体宣传拓展了网络的外部吸引力。内生动力与外援动力的互构并融深刻影响着石头城旅游生计演变的进程。

（三）滇西北民族村寨旅游生计变迁是资源禀赋差异性与行动者网络异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变迁路径既存在共性规律，也具有个体差异。共性规律揭示了民族地区实现生计现代化的普遍方式，差异化路径则彰显了不同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与治理模式下民族村寨发展的地方性实践逻辑，为理解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文化遗产活化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范本。

（四）疫情冲击揭示了单一强制通行点（OPP）主导下行动者网络的脆弱性，凸显了构建韧性行动者网络的现实必要性。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多元行动者的共同利益，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增强村寨生计的可持续性，本文从重构网络核心、深化转译过程、增强网络韧性三方面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推进石头城的长效可持续发展。

总之，本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为分析框架，通过宝山石头城的案例分析，为阐释民族村寨在旅游驱动下的生计方式转型过程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既回应了滇西北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为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同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实践提供实证支撑，兼具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区域发展指导意义。

A Study on Policy-Driven Livelihood Patterns in Ethnic Villages about the Tourism of Shitoucheng in Lijiang

LI Zhihuan, ZHAO Zhi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Guizhou*, *China*)

Abstract: Taking Shitoucheng village at the foot of Baoshan Mountain in Lijiang of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dopts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and integrate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for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ethnic villages with policy impe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n-human actors such as Dongba culture, terraced field systems, and stone-masonry dwellings, by the symbolic rigidity of material inertia and culture, restrict large-scale standardized tourism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heterogeneous actors conduct localized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around the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 of "tourismization of ethnic village", promote changes in local livelihood capital structure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ultimately form a policy-driven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with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volving policy embeddedness, part-time leadership and diverse complexity overall. Through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with the "market-driven path" of Xizhou Ancient Town in Dali, and combining the network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of ANT, three optimized paths are proposed: prioritizing the shift of rural tourism from high-speed development to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and reconstructing the network core; improving a management structure from government dominance to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 to deepe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explo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single livelihood pattern to diversifie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o enhance the general network resilience of the actor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boundary of ANT in ethnic villages of Southwest China and provides a process-based analytic framework of explanation for rural tourism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ethnic village tourism; livelihood transition; livelihood patterns; rural revitalization; Shitoucheng village in Lijiang

（责任编辑：杨谨瑜）